



金代图书 出版研究

Study on Bibliogony in Jin

李西亚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研究

金代图书

李西亚 著

Study on Bibliogony in Jin Dynas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代图书出版研究 / 李西亚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9

ISBN 978 - 7 - 5161 - 6800 - 4

I . ①金… II . ①李… III . ①图书出版—文化史—研究—中国—金代 IV . ①G239. 294.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216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莉
责任校对 佳文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近年来，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虽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至今也没有一部论述金代出版史的专著问世，影响我们对中国古代出版史的完整认识。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中，没有金代出版史的研究，将无法形成一条完整的链条。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并立着多个民族政权，先是与北宋并存的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继而是与南宋划江而治的女真族建立的金朝。金代在文化上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继承了辽与北宋的成就，在与辽、南宋并立的120年时间里，与周边各族及其政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文化交流，实现了金朝文化的逐步发展与完善，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区域内，取得了出色的出版成就。早在1940年，郑振铎就指出金代所刻版画《四美图》：“因为太精美了，有人怀疑其不是金代之作，而将其时代排后到元、明之际（14世纪后半期）。”^①张博泉先生也在80年代指出金“平水印刷术超过北宋，而且南宋、元也不能与之相比，开后来元刻平话附图及明刻传奇附图之先声。”^②然而由于历史研究者中还有很多人对民族政权的文化发展存有偏见，对金代出版史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使得金代在出版方面的贡献长期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青年学者李西亚向来勤奋好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畏艰辛，敢于攻坚，选取金代图书出版史进行探索与研究，历时四载终于写成博士论文。毕业后在此基础上写了数篇论文终成《金代图书出版研究》一书，弥补了中国古代出版史没有金代图书出版专著的缺憾，对推进中国出版史和

① 郑尔康：《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②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金代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立意创新，在诸多问题上提出独到见解，尤其是从金代图书出版的视角，探讨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之一的金政权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具有突出的思想价值和理论价值。关于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历史文化的认同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同仁的高度重视，正如向燕南等人所著的《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书中指出的，“公元 10 世纪到公元 19 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认同传统”，“无论是在历史认同方面，还是在文化认同方面，都有着突出表现的。”^① 和大多数研究者较为趋同的是，向著也主要从心理、制度及道统等三个方面来研究历史文化认同问题。“所谓文化认同的传统，由表及里大致存在着物质、制度和思想三个层次，而最能表现主体文化情感认同意识的，则主要是在心理、制度和道统方面的认同。”^② 作者在本书中也从图书出版的角度阐释了金人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作者指出，金代统治者对汉文书籍的搜求与刻印，表面上来看是中原汉文化对金朝统治者的吸引，是金统治者加强统治的需要，但实质上金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认识与态度，更深层面体现的是作为统治民族的女真族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这就使得金代图书出版问题的研究，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作者能够从传播与历史的多维视角来认识金代图书出版的发展过程。从出版的视角研究出版的历史，以史学的方法研究历史的出版。站在大的历史视角下，纵向探讨了金代出版上承辽、宋，下迄元、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横向分析了金与同时期南宋和西夏出版业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站在文化传播的角度考察金代图书出版与金代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均使这部著作有别于以往的出版史，具有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作者用力甚勤，发掘了大量史料，钩稽贯串，爬梳分析，克服了金代出版史研究史料匮乏的困难。不仅反复查阅《金史》和金人文集笔记，还注意利用宋、辽、西夏、元和高丽等各政权的史料，注意将各个政权

^① 向燕南等：《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2 页。

^② 同上书，第 42 页。

分散的金代图书出版的资料以剥茧抽丝的方式整理出来，分析史料背后隐藏的金代图书出版信息。如对石刻资料中墓刻碑文的解读，对《道藏》的翻阅。作者不仅注重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搜集，还注意查阅现存的金代出版实物，分析其装帧、版式特色等等。可以说，作者在资料搜集方面投入了极大精力，举凡能够使用的资料大体搜览殆尽，极大地丰富了该书的写作内容和各方面的信息。所表现出的勤奋与对史料的考证功力，使得《金代图书出版研究》这部学术著作得以与读者见面。

作者对金代图书出版管理和家宅刻书等项作了探索性研究，并以新的史料，对《金史·艺文志》、金代刻书地点、刻书机构等进行增补，发前人之所未发，显示出作者的考证功力与见识。本书还有《金代经部书籍各类及数量统计表》等“附表”多达十篇，表现出作者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和工作的认真细致。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法文译文中曾讲到：“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通过此书，可以想见作者为研究金代图书出版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与艰辛。希望她能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笔者对金代出版史并无研究，怎奈李西亚盛情邀请为其大作写上几句话，不好推辞，只好写了上面一些话，难中肯綮，尚请作者和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吉林大学 赵永春

2015年9月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意义与研究范围	(1)
二 研究现状	(3)
三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16)
第一章 金代图书出版发展概貌	(20)
第一节 金代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历史条件	(20)
一 金代统治者对图书出版业的重视	(21)
二 金代经济发展对图书出版业的推动	(26)
三 金代文教事业的勃兴对图书出版业的促进	(32)
第二节 金代图书出版业的概貌	(41)
一 太祖、太宗时期图书出版的起步	(42)
二 熙宗、海陵时期图书出版的发展	(43)
三 世宗、章宗时期图书出版的繁荣	(44)
四 卫绍王以后图书出版的继续发展时期	(45)
第二章 金代对图书出版的管理	(46)
第一节 金代图书出版机构的设置	(46)
一 国子监	(47)
二 国史院	(49)
三 秘书监	(50)
四 译经所、弘文院	(51)
五 详定所、详校所	(52)
六 转运司	(53)

第二节 金代对图书出版的管理	(54)
一 图书出版以中央政府或皇帝的行政命令为旨归	(54)
二 对图书刻印与收藏的限制	(56)
第三章 金代图书的编纂	(62)
第一节 金代图书编纂种类与规模	(62)
一 经部书籍的编纂	(62)
二 史部书籍的编纂	(64)
三 子部书籍的编纂	(66)
四 集部书籍的编纂	(68)
第二节 《金史·艺文志》补	(70)
一 前人补写《金史·艺文志》	(70)
二 《金史·艺文志》考补	(71)
第四章 金代的图书刻印	(77)
第一节 金代的刻书地点考补	(77)
一 上京路会宁府	(78)
二 西京路大同府	(80)
三 南京路考城县	(80)
四 南京路宿州	(80)
五 河东南路赵城县	(81)
六 平阳府洪洞县	(81)
七 京兆府路乾州	(82)
第二节 官方刻书	(84)
一 官方刻书的种类	(84)
二 官方刻书的特点	(100)
第三节 私人刻书	(101)
一 书坊刻书	(102)
二 家宅刻书	(111)
第四节 寺院和宫观刻书	(121)
一 寺院刻书	(121)
二 宫观刻书	(127)

第五章 金代图书的装帧设计	(138)
第一节 版式	(138)
一 边栏和鱼尾	(139)
二 行款	(140)
三 用字	(141)
第二节 插图与装式	(144)
一 插图	(144)
二 装式	(146)
第六章 金代图书的流通与收藏	(150)
第一节 金代图书的流通方式	(150)
一 市场中的图书买卖	(150)
二 学校中教材的颁发与使用	(153)
三 政府的搜求与赐赠	(158)
四 私人间的借阅、传抄	(159)
五 与周边政权间的图书交流	(159)
第二节 金代图书的收藏	(165)
一 图书收藏	(165)
二 图书典藏的发展对图书流通的促进	(173)
第七章 金代图书出版的特点、作用与影响	(177)
第一节 金代图书出版的特点	(177)
一 金代图书出版处于相对宽松和有利的环境之中	(177)
二 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180)
三 在继承中实现新的突破	(181)
四 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	(183)
第二节 金代图书出版的作用与影响	(184)
一 推动了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184)
二 推进了金代社会的汉化进程	(185)
三 直接影响到了元代的图书出版	(186)

结语	(188)
参考文献	(192)
附录	(208)
一 《金史·艺文志》统计表	(208)
二 《金史·艺文志》补表	(265)
三 金代所刻书籍统计表	(266)
后记	(276)

绪 论

一 选题意义与研究范围

辽宋夏金时代正值我国出版业的黄金时期，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继承了辽与北宋已有的出版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将出版业拓展到了更广阔的边疆地区。在印刷技术方面，金朝甚至超越了南宋的发展水平，“平水印刷术超过北宋，而且南宋、元也不能与之相比，开后来元刻平话附图及明刻传奇附图之先声”，^①对推动我国北方地区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元朝的出版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金代出版业的发展，在我国出版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版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金代出版业的发展在促进文化传播及金代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金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成就的取得都与出版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无论从出版史研究的角度，还是从金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金代图书出版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学界对金代图书出版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前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多是针对各出版环节的单独研究，没有将金代图书出版的各个环节整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因此，将金代图书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进行全方位的整体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金代图书出版发展变化的原因、特点及其与金代社会所产生的相互影响，进一步探讨出版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寻找出版发展的规律。第二，前人对金代图书出版

^①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 页。

的研究仍是运用传统出版学的研究方法，使用旧的研究模式，多数文章与著作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其原因是没有新的出版史料的发现，在研究上难于创新，这就要求在研究上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研究体系。近年来传播学理论的引进为出版研究走出旧的范式提供了出路，将传播学理论引入出版研究是近些年新兴的研究出版现象的方法，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产生，但对于金代图书出版传播的研究目前还无人问津。本书从传播学的角度对金代图书出版进行了研究，并对以前研究相对薄弱的金代图书编纂、金代刻书地点、金代图书的流通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展示金代图书出版全貌的同时，探析金代图书出版的特点、作用与影响。

研究图书出版首先必须明确“出版”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确定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出版”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不同的认识视角下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学界对于出版的定义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目前主要有两要素说和三要素说。两要素说的主要观点认为，兼具复制与发行两个步骤的活动即为出版，如《世界版权公约》对“出版”的定义是：“可供阅读的或视觉可以感知的著作物以有形的形式加以复制并向公众广泛发行。”即将著作物通过某种手段或技术制作出多个复印件，再将这些复制品向公众传播，就是出版。只对作品进行复制或是只对原件进行发行都不能称为出版。如我国古代，印刷术发明以前，通过手抄的方式，将著作制成多份手抄本的复印件，再拿到市场上出售，即为出版。印刷术发明以后，雕版印刷成为复制品的主要手段。以两要素标准界定出版含义的表述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三要素说的主要观点认为，出版是兼具编辑、复制与发行三个步骤的活动。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73）对“出版”的定义是：“对书写的著作物的选择、复制与发行。”国内很多学者也采用此说，如许力以提出：“出版，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① 全冠军认为：“出版就是将知识、思想或信息产品经过加工以后，以手抄、印刷或其他一切方式复

^① 许力以：《出版和出版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总论》，许力以：《许力以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制在一定物质载体上，并通过出售或其他途径向社会传播的活动。”^① 于翠玲则认为：“著述者提供的原创文本，通过媒介（版本载体、复制技术）或中介环节（专业化的媒介机构）达到向公众发布以及扩散传播目的的行为，就是出版。”^② 以上用三要素说界定的出版概念，在复制与发行这两要素之上增加了编辑要素。一般而言，两要素说代表早期的或起码的出版活动，三要素说代表成熟的出版活动。研究出版史需以三要素说作为出发点，考察历史上包括两要素在内的所有出版现象，进而探讨出版活动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③

现在大多数组人均认同三要素说，本书也采用了这种观点，即认为出版是指对知识、信息进行加工，并复制到有形的物质载体之上，再通过此复印件将信息内容传递给众多的受众，以实现信息流通和共享的社会活动。该定义指出了出版的三个基本环节为编辑、复制与流通。但由于宋金时期的图书编辑还未完全从编纂中分离出来，仍属于图书编纂、编撰的范围，并不像现代出版社的编辑是与著述完全分离的性质。此时的出版还不是成熟的出版活动，因此，依据三要素的定义，本书中金代图书出版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金代图书的编纂、金代对图书出版的管理、金代图书的刻印、金代图书的装帧设计以及金代图书的流通与典藏，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金代图书出版的特点、作用与影响进行分析总结。

二 研究现状

有关金代图书出版的研究虽然已有了一些成果，但主要集中于图书印刷的单项研究，忽略了图书的编纂与流通环节。一些印刷与出版的通史性著作对金代的论述也都较为简略，同时更没有一部针对金代图书出版进行专门研究的专著面世。

（一）金代图书出版发展的历史条件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金代图书出版发展的历史条件的研究可以说比较多，

^① 全冠军：《出版概念研究中的三种倾向》，《出版广角》2008年第11期。

^② 于翠玲：《“出版”溯源与中国出版活动的演变》，《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③ 刘光裕：《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关于编撰中国古代出版通史的基本看法》，《出版科学》2008年第3期。

凡是论及金代印刷或出版的研究均对此有所涉及，但主要是局限于金政权所实行的文化、教育、宗教等政策的宏观层面，而且集中于探讨文化方面的原因，经济方面的发展条件无人提及。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张秀民《辽、金、西夏金刻书简史》首次谈到金搜集宋的图书典籍情况，可以说是对金代雕版印刷业发展原因的探析。^①

张树栋等人的《中华印刷通史》在论及金代刻书事业发展的原因时认为，金政权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和图书典籍的收藏。^②

李致忠在《历代刻书考述》一书中分析了金代刻书的社会背景，认为女真文字的创制，兴学立教、尊孔读经、科举选士，乃至于大量索取宋刻图籍板片，烘托起了刻书业发展的文化氛围。^③

冯方的《辽金刻书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一文对金代刻书业发达的原因论述较为全面，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1）仰慕唐宋汉文化，统治者大力提倡；（2）金统治者设立学制及科举取士，皆重视儒教；（3）统治者提倡佛教、道教；（4）通过战争，大肆掠夺宋的财富，外加书籍、刻书板片及能工巧匠。所侵占宋的北部地区，又多为汉人，这些亦成为金刻书发达不可缺少的条件。^④

（二）金代图书出版管理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金代图书出版的管理问题关注的并不多，研究成果只是集中于对在平水所设的出版管理机构的考证上。

目前学界认为金在平水设立了当时唯一的出版管理机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最早的论断出自清代钱大昕《钱氏日钞·跋〈新刊礼部韵略〉》，钱氏认为金于平阳设有刻书机构，其官职为“书籍”，平水书坊主王文郁曾任此职。元朝设于此的经籍所是“因金之旧”。^⑤ 这是最早关于

^① 张秀民：《辽、金、西夏刻书简史》，《文物》1959年第3期。

^② 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台北：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2004年版，第246页。

^③ 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151—155页。

^④ 冯方：《辽金刻书业的发达及其原因》，《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

^⑤ 杨绍和：《楹书隅录》卷3，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史部目录类，第926册，第589页。

金代出版管理机构的论述，此结论一直沿用至今。

留庵编纂《中国雕版源流考》^① 把元朝太宗八年（1236）六月“立经籍所于平阳”（平水也称平阳，详见后文）。误作为金太宗八年之事。1925年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②一书中也将元太宗八年立经籍所一事误认为发生于金代。此后这一误读还被一些著作沿用，如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肖东发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③，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④，高信成著《中国图书发行史》^⑤等。

北京图书馆编写的《中国版刻图录》^⑥一书也认为平水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因此金元两朝政府都在当地设立了管理书籍出版的机构。

张博泉在《金代经济史略》^⑦一书中也承认金在平水设有专门出版机构，并对其职责进行了初次定性，认为这一机构负责管理当地的民营书坊和书铺。

李晋林在《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一文中对平水所设书籍管理机构从两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首先进一步对钱大昕的观点进行论证，再次确认平阳所设机构的职官名应为“书籍”，金代平水书坊主王文郁曾任这一官职。其次对这一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进行了推测，认为其与其他官方手工业管理机构类似，“负责平阳当地官方和民营雕版手工业的管理和税收”^⑧。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均认为金于平水设有刻书管理机构，但是其论据还不够充分，对于这一机构的性质和职责也只是进行了推测，并未形成确切的结论，所以对平水刻书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性质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而金代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态度、金代其他图书出版管理机构及相关出版管理措施等问题还无人问津，这也为本书的研究留下了较大的拓展空间。

^① 留庵：《中国雕版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② [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胡志伟译，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

^③ 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④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 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

^⑦ 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 李晋林：《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上），《文献》2001年第2期。

(三) 金代图书的编纂与翻译研究

1. 明末清初对金代图书编纂概况的统计与研究

关于金代图书编纂情况的研究最早应从清初《金史·艺文志》的编撰开始，由于元人编写的《金史》无艺文志，金代图书的著述情况一直不明，直到明末清初才有人开始对金代艺文状况进行整理，相继问世了六种金代艺文志，倪灿和卢文弨的《补辽金元艺文志》（金代部分）、金门诏的《补三史艺文志》（金代部分）、纪昀的《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金代部分）、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金代部分）、龚显曾的《金艺文志补录》和孙德谦的《金史艺文略》。龚显曾的《金艺文志补录》采录《全金诗》《四库书目提要》《中州集》《归潜志》《国史经籍志》《经义考》《爱日精庐藏书志》等各书中记载的金人撰述，并以倪灿、金门诏两种三史补志和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所附辽金部分著录图书，补其缺略，以成此志。分四部 40 类，著录书籍 451 种。孙德谦的《金史艺文略》采录金人著述，共有 409 种。大部分加以考证，并标注出处。今人杨家骆编有《新补金史艺文志》，在汇集以上六部艺文志基础上，增收清代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

庄仲方的《金文雅》是最早的金代诗文总集，全书 16 卷，共选入 80 人的作品，包括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诏令、册文、奏疏等 27 类，卷首有作者的生平简介。张金吾《金文最》^① 搜集有金一代之文成 120 卷，所收金文远远超过《金文雅》，全书包括赋、骚、册文、制诰、策问、奏疏、铭等 42 类。陈衍《金诗纪事》是一部金人的诗评汇编，共 16 卷，专收金人“有事之诗”，涉及 180 余人。此书采用传统的诗纪事形式，汇集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此书现有今人王庆生增订本^②，增补 240 人的作品。这两部金代诗文选集，为了解金代著述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以上成果主要是对金代图书的种类、数量与内容的整理和辑佚，较少对其进行评述，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金代图书编纂的研究方面得到了改变。

^① (清) 张金吾：《金文最》，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② 陈衍辑撰，王庆生增订：《金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2.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金代图书编纂的综合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金史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金代图书的编纂问题也逐渐被纳入到一部分学人的视野之中。与明末清初之季仅关注金代图书种类与数量所不同的是，当代金史研究者更多的是开始注重金代图书内容的研究，并增加了分析述评的内容。总的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金代文化成就的角度进行论述；另一类是从图书编撰角度进行的研究，下面分别从这两方面进行介绍。

张博泉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版的《金史简编》一书中，曾专辟“金朝文化”一章对金代的文学、哲学和史学、科技和医学成就做了全面的论述，并对各学科有代表性著述的编纂情况及其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① 何俊哲等人的《金朝史》^② 和李桂芝的《辽金简史》^③ 在总结金代史学和文学编纂成就的基础上，对所涉及的各类著述也进行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周惠泉的《金代文学研究》一书，则针对金代文学方面的 16 种著述进行了评介。^④ 刘时觉的《金代医籍年表》一文，著录了现存的从 1127 年到 1279 年间北方医学古籍，并分别列出每部图书的成书时间、作者、卷数和刊行时间。^⑤ 宋德金所著《中国历史·金史》一书在金代科技成就一编中对金代语言文字、儒学、史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与医学成就进行了全面梳理，涉及各学科著述的编纂情况，特别是对金代史学编纂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⑥ 齐木德道尔吉的《辽夏金元史征·金朝卷》一书，则在阐述金代的文学、戏曲及史学成就时涉及了相关著作，但该书主要以罗列史料为主，较少对图书内容等问题进行评论。^⑦

曹之的《中国古籍编撰史》一书，主要是对金朝官修经史和编撰家及其编纂事例进行了介绍。^⑧ 其还在《辽金元图书编撰考略》一文中从官

^①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何俊哲等：《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 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④ 周惠泉：《金代文学研究》，文津出版社 2000 年版。

^⑤ 刘时觉：《金代医籍年表》，《中医药学报》2004 年第 6 期。

^⑥ 宋德金：《中国历史·金史》，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⑦ 齐木德道尔吉：《辽夏金元史征·金朝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⑧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